

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解析

王光厚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南海; 中国

[摘要] 近两年来, 澳大利亚对南海局势亦开始予以密切关注, 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的新的外部因素。无论从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层面来看, 南海及其邻近地区对澳大利亚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因而南海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非常重要”。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三个基本取向: 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 防范中国“控制”南海; 力倡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 并对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方面只要能够增进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南海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互信, 完全可以控制、减弱甚至消除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1)06-0010-06

Analysis on Australi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Wang Guanghou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Keywords: Australia;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Australia has also begu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comes a new external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the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ustralia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South Sea China Sea and its adjacent regions. Therefor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very important” for Australia. Australi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has three basic orientations, namely to keep the similar pos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prevent China from “controll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o push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ustralia's involv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exacerbates the complexity, continuanc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issue, and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pattern. China would control,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 caused by Australia's involv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f it can enhance mutual trust with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lated claim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当前, 南海问题正呈现出扩大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这一局面的出现, 一方面源于某些南海声索国的单方面行为, 另一方面与区域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传统上, 美国、日本、印度等国是影响南海局势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近两年来, 伴随澳大利亚逐步向亚洲靠拢, 它对南海局势的发展亦开始予以密切关注。尽管就国家实力而言, 澳大利亚无法同美、日、印等国相提并论, 但也毕竟是一个“中等强国”, 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将给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

素。深入探究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意图及其影响, 可为中国应对南海局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一 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是以其对南海在澳大利亚生存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判为基础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南海)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非常重要”^[1], 南海争端的处理直接关乎澳大利亚的国家

[收稿日期] 2011-11-16

[作者简介] 王光厚, 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南海开发与广东省海洋经济建设研究”(10ZGXM8400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南海周边国家与地区南海政策与中国南海维权”(11YJAGJW008)。

利益关系。

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海地区对澳大利亚而言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一,中国与身为南海岛屿和海洋权益声索国的一些东盟国家都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经济伙伴。长期以来,东盟一直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据统计,2009年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8.5亿美元^[2]。2010年1月1日,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将为澳大利亚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由于近年来对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激增,中国现已迅速成长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据统计,2010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达到880.92亿美元^[3],澳大利亚处于明显的出超地位。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其二,南海航线是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出口农矿产品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东北亚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区,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和资源较为匮乏的日本、韩国对澳大利亚的农矿产品需求量极大。目前,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分别位列澳大利亚的第二和第四大贸易伙伴,而澳与东北亚的贸易额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其国内的贸易额^[4]。澳大利亚地处大洋洲,海洋运输是澳大利亚与东北亚诸国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出于运输成本和运输安全的考量,目前澳大利亚很大一部分国际贸易是经由南海到达东北亚市场的^[5]。南海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全局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这条贸易通道如果被切断,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也将陷入困顿。其三,参与南海资源开发是澳大利亚在南海地区的又一项重要经济利益。南海地区蕴藏着各种丰富的战略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更是引人注目,甚至有“第二个波斯湾”^[6]之称。南海区域外部的某些国家之所以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其目的之一是试图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勘探和开发上分得一杯羹。澳大利亚虽然是世界著名矿产大国,但是石油资源却较为匮乏。如果能够参与南海地区的石油开发,澳大利亚就可以更为便利地获得石油。目前,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集团(BHP Billiton)已经获得在南沙群岛附近的一个争议海区进行勘探的权利。

其次,南海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是澳大利亚安全防范的主要区域。在国家利益构成的诸要素中,安全利益居于基础与核心地位,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7]。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保证自身的生存是其首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尽管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四面环海且不与

大国为邻,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作为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孤悬于南太平洋的国家,自身未来所可能受到的威胁是全方位的和不确定的”^[8]。在澳大利亚看来,除了其本土和邻近海域外,澳大利亚在“从北部亚洲到东印度洋之间的亚太更广阔区域”亦有着“持久的战略利益”^[9]。这其中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对澳大利亚的安全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战略上,我们(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邻居地跨我们北部的门户。为了持续部署力量来对抗澳大利亚,敌对势力将会操控这一门户。一个稳定而团结的东南亚将会减弱这种威胁。”^[10]目前,“为了防范可能来自北部海岸的入侵”,澳大利亚海军已经将“战略防御重点由东部和南部改到北部和西部”。为此,澳大利亚海军在北部海岸配置了警戒雷达体系、在北部海区的重要水域和水道布设了海底声纳基阵、加强了北部海区的海上巡逻,而澳大利亚的海军舰艇也以北部和西部为防御重点配置了“三级保卫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通过海军出访、联合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与培训等方式密切了同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的军事合作,以保持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11]。南海地处东南亚的核心区域,如果南海海域出现动荡局面,那么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将会受到波及。届时,与东南亚毗邻的澳大利亚亦难以独善其身。就此而论,保持南海海域的稳定系澳大利亚的重要安全利益之一。

最后,介入南海事务有助于澳大利亚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除了经济发展需求、国家安全需求外,在国际社会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发挥一定的作用也是一国所追求的主要国家利益。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坚持“中等强国”的国家定位,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2]。近年来,随着国家力量的提升,澳大利亚渴望发挥一定政治影响的愿望更趋强烈。陆克文时期,澳大利亚进一步提出了成为“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外交目标^[13]。与超级大国不同,“中等强国”赖以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舞台主要是区域性的。对澳大利亚而言,亚太是其开展独立外交的主要区域,而东南亚则是其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理想平台。这是因为:其一,除了大洋洲诸国外,东南亚在地理上与澳大利亚最为临近;其二,不同于亚太其他地区,东南亚并不存在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其三,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早在1974年澳大利亚就成为了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其四,东南亚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其五,就东南亚方面的情况来看,后冷战时期的东盟积极推行“大国平衡”战略^[14],欢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国参与本地区的事务,东盟邀请澳大利亚参加

首届东亚峰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基于上述因素,近年来澳大利亚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扩大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目前,澳大利亚无论在政治—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与东盟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15]。其主要标志是,2010年10月澳大利亚与东盟召开了首次峰会。南海问题不但直接牵涉到东盟几个国家,而且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息息相关,因而,介入南海问题无疑会提升澳大利亚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以其国家力量为基础和后盾的。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来说,上述三项战略诉求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性的。例如,防范敌对势力控制东南亚与寻求外交独立性两项利益诉求就很难兼顾。这就需要澳大利亚根据具体的国际环境来平衡这三项战略利益诉求,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前,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取就是平衡这几项战略利益的结果。

二 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取向

澳大利亚是新近介入南海问题的外部力量。不容否认,如同印度等国一样,目前澳大利亚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很难说已经形成某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内涵”^[16],而澳大利亚政府也没有出台明确针对南海问题的外交文件,因而我们无法对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进行精细的探讨和分析,但是通过澳大利亚的有关对外活动,我们依然可以判断出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取向。

首先,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紧密跟随美国在南海区域的有关行动。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澳大利亚以美澳同盟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点,美国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因素。”^[17]澳大利亚认为,美国在军事领域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现实确保了过去几十年亚太地区经济令人瞩目的增长^[18]。在澳大利亚看来,尽管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2030年以前,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仍将是实力最富和影响力最大的战略角色”。对澳大利亚来说,美澳同盟“是其最重要的防务关系”,“当澳大利亚处于一个军事力量超过其抵抗能力的大国的威胁之下时,澳大利亚只能够依靠美国提供帮助”^[19]。有鉴于此,尽管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外交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上,澳大利亚依然保持着与美国亦步亦趋的关系。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亦唯美国马首是瞻。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10年7月

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20]之后,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也明确表示南海问题关乎澳大利亚的利益,成为公开就此问题表态的又一个域外国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9月15日,澳大利亚与美国“2+2”年度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声明专门阐述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声明明确指出“与国际社会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以及畅通的合法商贸方面,拥有国家利益。”^[21]该声明的发表凸显了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参与了美国在南海附近海域所进行的有关军事活动。例如,2011年7月,当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的南海争端不断升温之际,澳大利亚海军会同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濒临南海的文莱附近海域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此次军事演习规模虽小,但是鉴于其演习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搜寻到若干政治信号。

其次,对中国存有一定的防范心理,担忧南海为中国所“控制”。在南海争端各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大国。南海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除了南海本身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外,还因为一些国家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试金石”^[22]。近年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有中国崛起后将会改变现状、建立霸权之类的“中国威胁论”却不绝于耳。澳大利亚虽然在经济上保持着同中国的密切联系以求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却有着较强的防范心理。澳大利亚在2009年发布的题为《在亚太世纪保卫澳大利亚:2030年军力》的国防白皮书中专门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将发展一支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全球性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中国不能对其军事计划进行详细解释,同时也不能为建立信任而与其他国家就其军事计划进行沟通,那么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规模和结构将有可能使其邻国有理由产生疑虑”^[23]。该白皮书虽未直接将中国列为澳大利亚的现实对手,但是其背后却隐含着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的意味^[24]。就南海问题而言,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海上武断行为”将引发“同邻国甚或美国的冲突”^[25],这实际上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此外,澳大利亚还在战略上对中国有所防范。如前所述,防范“敌对势力”控制东南亚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安全利益。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公开言明“敌对势力”有可能是哪个国家,但是考虑

到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历史等因素,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防范将会更多一点。对澳大利亚来说,如果中国“控制”南海,进而掌控整个东南亚,其在安全上将陷入被动。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将中国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者和地区及国际事务的自信参与者,是澳大利亚有重大利益需要接触的对象”^[26],所以尽管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有所防范,但是却力求避免在此问题上“触怒”中国。因而,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一定的两面性。

最后,力倡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出现选边站的困局。澳大利亚“作为地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一直有偏东还是偏西的选择”^[27]。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以及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意识的增强,澳大利亚的外交重心逐步向东亚一方倾斜。当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与东亚同行的战略态势基本形成。这使得澳大利亚不但在安全上无后顾之忧,而且在经济上搭上了东亚这趟快车。顺应此种战略态势的需要,澳大利亚希望南海局势能够保持和平与稳定。这是因为,一旦南海出现动荡局面或战争,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都将严重受损。从经济层面看,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但会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与有关国家的贸易,而且澳大利亚通往东北亚主要贸易伙伴的海洋通道也会因之受阻。从战略层面来看,南海局势的恶化很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军事介入,届时澳大利亚将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困局^[28]。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澳大利亚在美国和东亚的中国之间同时获益的局面将被彻底打破,而且澳大利亚所忧虑的“敌对力量控制东南亚”的梦魇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实现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积极倡导南海有关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例如,早在1999年,澳大利亚外长多纳在东盟地区论坛曾就“南海行为准则”提出了一些非正式建议^[29]。又如,澳大利亚多次明确表示支持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希望各方能够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倡导和推动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既可以使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发出一定的声音,又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实现。

众所周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并不是南海争端的“麻烦制造者”,且中国一直积极维护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因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防范”本身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当前,“南海局势总体是和平的、稳定的”^[30],澳大利亚的介入只能给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南海问题近年来之所以变得日趋复杂,其根源主要在于外部势力的介入。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南海的声索国,但是它却在南海问题上有着自身的利益关切,并且已经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政策意愿,这不可避免地给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的影响。

一方面,澳大利亚的介入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给该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开发了南海的岛屿礁滩,因而,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法理上看,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然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罔顾这一历史事实,强占我南海岛屿,瓜分我南海海域,掠夺我南海资源。为了增强抗衡中国的实力,这些国家积极施展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妄图将区域外部大国拉到自己的一边,这为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了良机。区域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南海问题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的态势,这不但阻碍了南海问题的解决,而且还恶化了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31]。澳大利亚虽然不是亚太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鉴于美澳同盟框架的存在、澳大利亚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澳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缘位置等因素,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依然起着不可令人忽视的作用。正是看到这一点,东南亚一些南海声索国在倚重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域外部大国的力量来抗衡中国的同时,还积极拉拢澳大利亚站在自己的一边。例如,2011年6月,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于堪培拉举行的部长级会谈上,双方专门就南海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32]。此外,由于美澳特殊关系的存在,南海局势的发展还存有澳大利亚通过东亚峰会等机制就南海问题在前台向中国“发难”,而美国背后操控的可能。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无疑会加剧业已十分复杂的南海博弈态势,给南海争端的解决带来更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众所周知,为寻求南海局势的稳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来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南海分歧,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争端。因而,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不言而喻将给中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紧随美国而动的政策取向直接关系到南海地区乃至整个东亚的安全格局的走势。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目前,“如何

应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影响”已经成为既有“主导国”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33]。尽管美国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的崛起”，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发展的性质和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使人对其（中国）未来在亚洲和以外的地方的行为和意图提出合法性的问题”^[34]。为防范中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存在。鉴于近两年来台海局势日趋稳定，美国转而介入南海事务，以塑造对己有利的区域安全格局，从而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正是基于这一战略考量，2009年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35]。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之一，美澳同盟是美国的“亚太战略之锚”。在协助美国应对南海局势、掌控南海地区安全格局方面，澳大利亚亦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澳大利亚海军拥有较强的实力，可以在南海地区出现危局的时刻协同美军进行有关军事活动；其二，部署在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的超视距雷达站、电子监听站、通信站等设施可为美国监控南海局势以及美军的有关行动提供信息、情报；其三，澳大利亚在地缘上与南海相距较近，可为美国在南海的有关行动提供后勤给养、人员休整等帮助。目前，美澳两国正在就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一旦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对包括南海在内的整个东亚的战略威慑力将大幅提升，区域安全格局与安全稳定将随之产生连锁变化。中国是美国战略防范的主要对象，美国在本地区战略威慑力的提升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安全压力。

由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是一个区域外部力量，因而对于其介入南海问题给南海局势发展所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方面不应仅仅局限于南海问题本身，而应立足对外战略全局，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有效应对。其一，增强中国与澳大利亚在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从战略层面来看，近两年来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南海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有所介入，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做出的政策反应。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具有两面性：它既认识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其带来的机遇，与此同时却在安全上对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有所防范^[36]。从中澳关系发展的大计出发，中国方面应设法减弱乃至消除澳大利亚对华的“顾虑”。为此，中国应当依托中澳“业已形成的良好互动态

势，紧紧抓住澳对中国高度关注的历史性契机，大力推进和平外交，以经济、文化为先导，积极拓展双边共同利益范围，建立互信，构建起一种良性的外交循环机制”^[37]。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冲突”^[38]，且不同于美、日、印等区域外部势力，澳大利亚对于南海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企图。因而，如果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能够有所提升，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力将会随之弱化。其二，从中、美、澳三边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如前所述，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的政策选取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紧随美国而动的倾向。由于美澳之间在多领域有着共同利益，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仍将会以澳美同盟为其对外战略的轴心^[39]。有鉴于美国在美澳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应当从中、美、澳三边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应对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和敏感问题”，但是“新形势下，两国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合作领域越来越宽”^[40]。因而，在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方面中美双方是大有可为的。中美关系如能实现健康发展，澳方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顾虑将会随之减弱，而前述的澳美同盟在南海问题上给中国所带来的安全压力也将会大大降低。其三，回归南海问题的基本面，处理好与有关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南海问题引起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诸多域外大国的关注，但是就其本质来看，此问题乃是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南海声索国之间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如果对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举措给予积极回应，反陷入其彀中。反之，如对其进行冷处理，并坚持通过双边友好协商来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南海局面将更易于管理和控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上述几对关系的处理实际上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如何提升彼此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的问题。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不但关乎南海局势的稳定，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的来看，尽管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给南海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对南海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中国方面能够处理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南海有关声索国这三对关系，其影响是可以控制、减弱，甚至是消除的。

【注 释】

[1] Daniel Flitton, "Spratly Spat Threatens to Overshadow Summi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22, 2011.

[2] ASEAN Secretariat, "Top Ten ASEAN Trade Partner Countries/Regions (2009)", <http://www.asean.org/stat/>

Table20. pdf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1年春季)》, <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cbw/201104/20110407511679.html>, 2011年4月22日。

[4] 芮捷锐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与中国维度》, 《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

[5] Carl Ungerer, "Ian Storey and Sam Bateman, Making Mischievous: the Retur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pecial Report of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Issue 36, December 2010, p. 2.

[6]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http://www.usip.org/files/resources/SR18.pdf>

[7] 阎学通 《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环球时报》2003年2月14日第5版。

[8] 甘振军、李家山 《简析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

[9]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p. 12.

[10] *Ibid.*

[11] 参见张炜主编《国家海上安全》, 海潮出版社, 2008年, 第332-334页。

[12] See Carl Ungerer,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53, No. 4, 2007.

[13] 有关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分析, 请参考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 《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

[14] 有关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分析, 请参考朱进、王光厚《论东盟的对外战略》,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5] See ASEAN Secretariat, "Overview of ASEAN-Australia Dialogue Relations", <http://www.asean.org/23213.htm>, October 2011.

[16] 王传剑 《印度的南中国海政策: 意图及影响》, 《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

[17] 张露、黄楫 《中国周边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大周边”战略理念与外交谋划的新探索》, 《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

[18]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Australia's National Defense: a defense update 2007*, http://www.defence.gov.au/ans/2007/pdf/Defence_update.pdf, p. 19.

[19]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p. 32, p. 93, p. 50.

[20]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23 July 2010.

[21] "Australia-United State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11 Joint Communiqué", [\[minister.gov.au/releases/2011/kr_mr_110916b.html\]\(http://www.minister.gov.au/releases/2011/kr_mr_110916b.html\), 15 September 2011.](http://www.foreign-</p>
</div>
<div data-bbox=)

[22] ASEAN Studies Center, *Energ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ASEAN and Its Dialogue Partner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Report No. 8, 2009, p. 78.

[23]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p. 34.

[24] 参见胡欣《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观与“中国威胁论”——解读澳大利亚2009年度国防白皮书》, 《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

[25] Dennis Richardson, "Australia: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http://www.dfat.gov.au/media/speeches/departement/111013_zelman.html, 12 October 2011.

[26] 同 [4]。

[27] 沈世顺 《澳大利亚外交新走向》, 《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

[28] Hugh White, "The Limits to Optimism: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4, Dec. 2005.

[29] Alexander Downer, "Australia Welcome Declarations on South China Sea", http://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02/fa162_02.html, 5 November 2002.

[30] 《杨洁篪外长在第1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的发言》,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842181.htm>, 2011年7月24日。

[31] 参见任怀峰《论区域外部大国介入与南海地区安全格局变动》,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

[32]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Philippines-Australia Ministerial Meeting (Canberra, 16 June 2011),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11/kr_mr_110616a.html, 16 June 2011.

[33] 《佐利克: 应对中国崛起影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363546.html>, 2006年5月11日。

[34]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p. 60.

[35] 参见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 《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

[36] 参见喻常森《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 《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

[37] 同 [17]。

[38] 胡欣 《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观与“中国威胁论”——解读澳大利亚2009年度国防白皮书》, 《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

[39] Paul Dibb, "U. 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Strategic Foru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o. 216, August 2005.

[40] 《胡锦涛主席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 《人民日报》2011年1月18日第1版。

【责任编辑: 吴金平】